

人
文学
科
文
库

北京
大学

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

欧洲合众国

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

李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方李邦琴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出版基金赞助

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

高毅 主编



欧洲合众国

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

李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合众国: 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李维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7965-6

I. ①欧… II. ①李… III. ①卡莱基-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5061 号

- | | |
|-------|--|
| 书 名 | 欧洲合众国——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
OUZHOU HEZHONGGUO |
| 著作责任者 | 李 维 著 |
| 责任编辑 | 初艳红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965-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alicechu2008@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学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75 印张 插页 2 242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5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图1 里夏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莱基



图2 父亲海因里希·库登霍夫-卡莱基



图3 母亲青山光子



图 4 隆斯贝格宫



图 5 青年卡莱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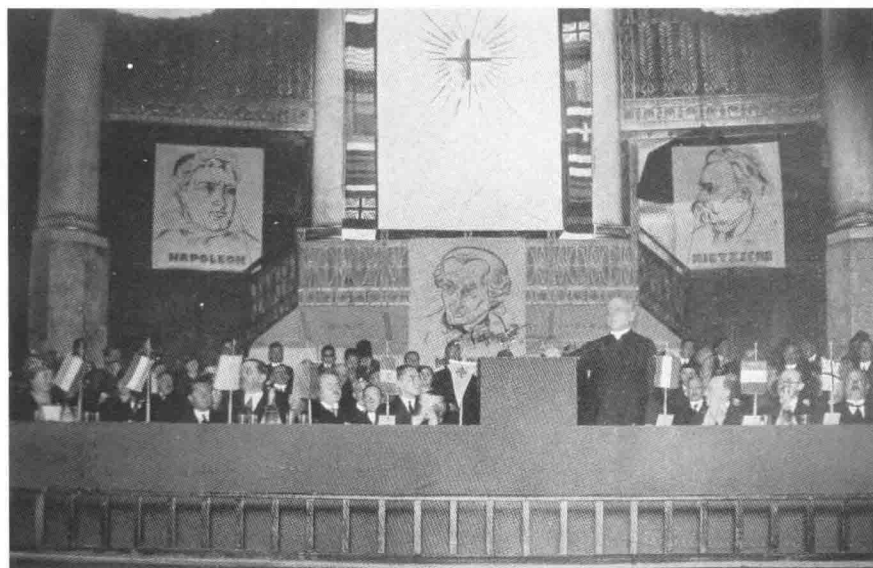


图 6 1926年10月,维也纳,第一次“泛欧”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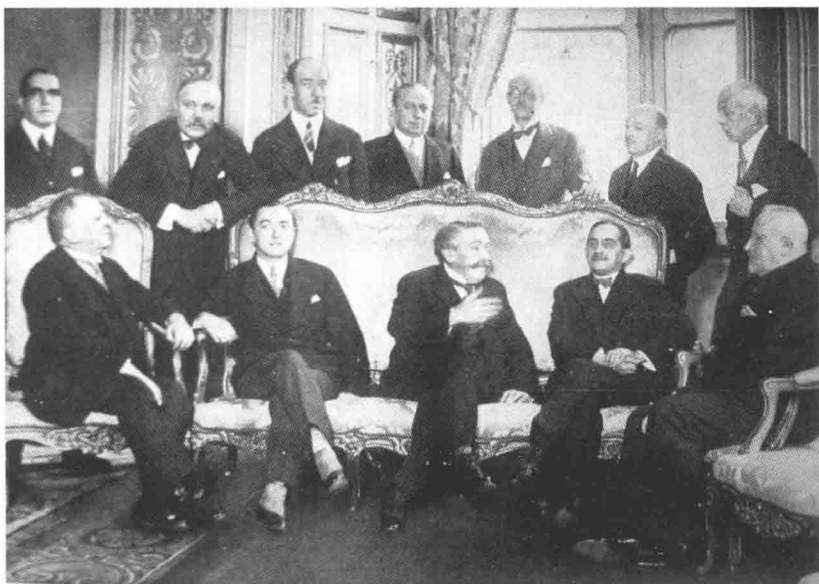


图7 1927年5月,“泛欧”中央委员会拜访白里安,前排左二为卡莱基,前排左三为白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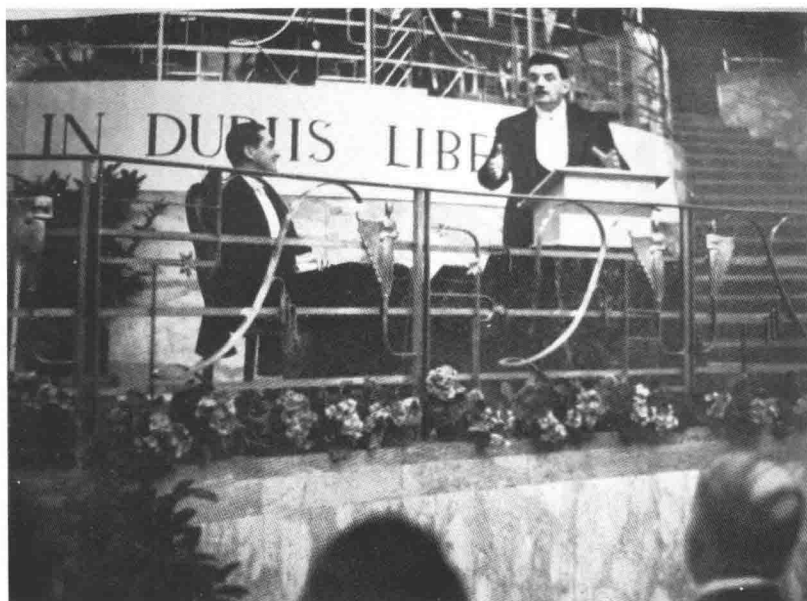


图8 1929年10月,赫里欧在柏林的“泛欧”集会上讲演,左侧为卡莱基



图9 1930年5月,柏林,第二次“泛欧”大会,3号人物是托马斯·曼,4号卡莱基,5号约瑟夫·维尔特,6号埃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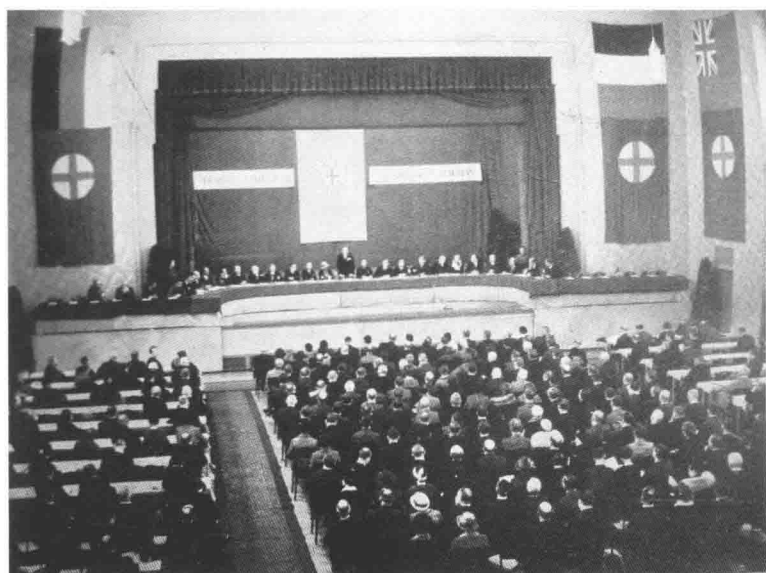


图10 1932年10月,巴塞尔,第三次“泛欧”大会

总序

袁行霈

人文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早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就设立了经学科、文学科,预科学生必须在五种外语中选修一种。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为现名,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1921年北大成立了四个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人文学科仍然居于重要地位,广受社会的关注。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文、理科合并为现在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成果斐然。改革开放后,北京大学的歷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近十几年来,人文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等各方面改善了条件,取得了显著成绩。北大的人文学科门类齐全,在国内整体上居于优势地位,在世界上也占有引人瞩目的地位,相继出版了《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世界现代化历程》《中国儒学史》《中国美学通史》《欧洲文学史》等高水平的著作,并主持了许多重大的考古项目,这些成果发挥着引领学术前进的作用。目前北大还承担着《儒藏》《中华文明探源》《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与研究工怍,以及《新编新注十三经》等重要项目。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北大人文学科整体的绝对优势正在减弱,有的学科只具备相对优势了;有的成果规模优势明显,高度优势还有待提升。北大出了许多成果,但还要出思想,要产生影响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思想理论。我们距离理想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需要人文学科的老和同学们加倍努力。

我曾经说过: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的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给社会带来财富,人们或以为无用。其实,人文学科力求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塑造理想的人格,指点人生趋向完美的境地。它能丰富人的精神,美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德,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国家的强盛与否,将来不仅要看经济实力、国防实力,也要看国民的精神世界是否丰富,活得充实不充实,愉快不愉快,自在不自在,美不美。

一个民族,如果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人文学科的热情,丧失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这个民族就丧失了进步的精神源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自觉维护自己的根,并以开放的态度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跟上世界的潮流。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人文学科,我们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

北大人文学科的老师们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创造性。我相信,只要使老师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北大人文学科便能克服种种障碍,在国内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人文学科的研究主要是著书立说,以个体撰写著作为一大特点。除了需要协同研究的集体大项目外,我们还希望为教师独立探索,撰写、出版专著搭建平台,形成既具个体思想,又汇集集体智慧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此,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决定编辑出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旨在汇集新时代北大人文学科的优秀成果,弘扬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展示北大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研究特色,为推动北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促

进入人文学术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需要努力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浓厚的研究气氛。既要提倡教师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研究课题,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研究,也鼓励教师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课题。鼓励自由选题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的一个特点。

我们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学术质量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的一大追求。文库的撰稿者会力求通过自己潜心研究、多年积累而成的优秀成果,来展示自己的学术水平。

我们要保持优良的学风,进一步突出北大的个性与特色。北大人要有大志气、大眼光、大手笔、大格局、大气象,做一些符合北大地位的事,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事。北大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甘于平庸,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小打小闹。北大的学者要有与北大相称的气质、气节、气派、气势、气宇、气度、气韵和气象。北大的学者要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为己任。而承担这样的使命,首先要有谦逊的态度,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兄弟院校学习。切不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这也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力求展现的北大的人文素质。

这个文库第一批包括:

“北大中国文学研究丛书”(陈平原 主编)

“北大中国语言学研究丛书”(王洪君 郭锐 主编)

“北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陈跃红 张辉 主编)

“北大批评理论研究丛书”(张旭东 主编)

“北大中国史研究丛书”(荣新江 张帆 主编)

“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高毅 主编)

“北大考古学研究丛书”(赵辉 主编)

“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丰子义 主编)

“北大中国哲学研究丛书”(王博 主编)

“北大外国哲学研究丛书”(韩水法 主编)

“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丛书”(王邦维 主编)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申丹 主编)

“北大外国语言学研究丛书”(宁琦 高一虹 主编)

“北大艺术学研究丛书”(王一川 主编)

“北大对外汉语研究丛书”(赵杨 主编)

这 15 套丛书仅收入学术新作,涵盖了北大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它们的推出有利于读者整体了解当下北大人文学者的科研动态、学术实力和研究特色。这一文库将持续编辑出版,我们相信通过老中青年学者的不断努力,其影响会越来越大,并将对北大人文学科的建设 and 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起到积极作用,进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2016 年 4 月

丛书序言

我们中国人，心中似乎常有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两者即使不至于风马牛不相及或老死不相往来，那也是从来就可以独立存在的两个东西。所以我们总是在说“中国与世界”“中国面向世界”“中国走向世界”，而不太习惯于把中国看作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

我们的历史学科至今还遵循着惯常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分法，便是这种心态的一个突出表征。

这一心态的形成有很多缘由：比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世上硕果仅存的一个未曾被其他文明征服过的古老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自立自足的“世界”；又比如中华民族天资聪慧、勤劳勇敢、治国有方、富甲天下，直到18世纪都还是令西人钦羡不已的文明楷模；再有就是明朝的屡屡海禁和清朝的长期闭关锁国，以及近代以来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形成的中西对抗关系；等等。总之，国人特有的“中国—世界”二元对立观成因复杂，其中交织着孤傲不群的文化自信、经典农耕文明的制度无奈，以及饱受近代列强欺凌之后挥之不去的政治忧思等许多元素。

于是我们所惯用的“世界史”这个概念也就有了一种“中国特色”，那就是它不止是源自西学的那种本来意义上的“全世界的历史”，同时还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所有国别史和地区史，

以及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西方史学史”这类与中国史无涉或关系不大的专题史或专门史。而且,这个中国式的“世界史”学科也不像西方史学中的同名学科那样一开始就有,而是迟至20世纪初年才生成的,其具体标志便是1904年京师大学堂中与“中国史学门”并立的“万国史学门”的设置。

其实当时的这个“万国史”,连总体意义上的“外国史”都说不上,因为它关注的基本上只是西方国家的历史,以至于自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北京大学后,它干脆就被称作“西洋史”了。^①只是尽管如此,它被正式纳入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序列,却不啻一次悄无声息的文化革命:因为这是“西夷”的历史破天荒第一次登上中国史学的神圣殿堂。

传说一向夜郎自大的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就愿意“睁眼看世界”了。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眼睛只是很不情愿地微微睁开了一条缝,结果看来看去我们只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几乎完全没有看到(或根本不屑于去看)西方的“历史”。于是我们后来又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吞下甲午惨败、洋务破产和《辛丑条约》等等许多苦果,直至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了,我们才幡然醒悟:原来救国的真正法宝并不是“西夷”的军事长技,而恰恰是他们的这种最让我们瞧不上眼的“历史”——因为唯有这种历史,才能告诉我们西方崛起的全部奥秘!所以,直到这个以“西洋史”为基本内容的“万国史学门”在京师大学堂的出现,我们才算向世界真正睁开了眼睛,而这种开放新姿的呈现,难道不正是“百年中国”抖落屈辱、重铸辉煌的历史起点吗?

当然,当时北大设立的这种以“西洋史”为基本内容的“万国史”还是相当偏狭的,所幸那只是中国“世界史”的一个带时代局限的早期样貌;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观照面会不断拓宽,直欲涵盖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我们知道,这正是在“文革”之前的那段毛泽东时代前期发生的一个伟大进程。尽管这个进程至今也没能最终完成,而且由于种种主客观

^① 参见拙文《不懂世界史,何来现代化?》,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条件的限制,具体的学术研究也多有缺陷,但由京师大学堂“万国史学门”的设置所体现的那种重视域外历史文化的开放意识,终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实际表现为一套学科建制和人员规模大体平衡的“中国史—世界史”二元结构的确立^①。倒是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却不期而然地出现了一次不良的异动:经过1997年的学科调整,世界史相对于中国史的学科比重由先前的3:4下滑到了1:2,跟着便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编制及经费的减少和整个学科规模的大幅度缩水^②。尽管经过多方努力,世界史终于在2011年2月被重新确认为与中国史并列的所谓“一级学科”,但要重新恢复资源配置的大致均衡,要让我们的世界史学科真正适应已全面深入地走进了“世界”的当下中国的需要,似乎仍遥遥无期。

其实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史。目前该学科的这种远不如毛泽东时代的萎缩状态,不仅和当下中国的大国地位根本不相称,而且势将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所以有关决策部门应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当然,中国的广大世界史学人,尤其是身处中国世界史发祥地的北大世界史学人,同时也得加把劲,努力做出自己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研究成果:事实上,也只有当我们的作品能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时候,域外历史的研究价值和人文魅力才能充分彰显,中国世界史学术推动国家进步的现实功能才能真正发挥,而我们的世界史学科目前所处的尴尬地位,也才有可能切实改观。

无需赘言,我们编这套“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的初衷,全都在这里了。任重而道远,道友当自强。

高毅

2017年元旦

^① 参见郭小凌:《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前世今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② 同上。

导 言

2001年,我还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Berlin-Lichterfelde)研究纳粹档案之余,曾随手调阅过“泛欧”(Paneuropa)运动的案卷。从那时起,库登霍夫-卡莱基(Coudenhove-Kalergi)的“泛欧”联合思想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关注。2003年,我在洪堡大学参加了卡莱基学术研讨会,对国际上的研究动态有了初步的了解。2009年起,开始赴德奥系统地搜集相关原始材料,准备申请课题。2010年,“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正式立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①此后我便开始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最具影响力。里夏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奥地利政治家、政论家。1894年11月16日,生于日本东京。1972年7月27日,卒于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施伦斯。卡莱基在波希米亚成长,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1917年获博士学位。1919年,奥匈帝国战败、解体后,他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23年,出版《泛欧》一书,由此发起“泛欧”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0BSS014。

运动,其目标是建立联邦制的“欧洲合众国”(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1926年,他在维也纳主持召开第一届“泛欧”大会,任“泛欧联盟”(Paneuropa-Union)主席。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卡莱基于1939年移民法国。1940年移居美国,1942年任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美国继续宣传欧洲联合思想。1943年建立“泛欧”联盟流亡机构,1944年成立“自由、统一欧洲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卡莱基返回欧洲。1947年建立“欧洲议员同盟”。1950年,卡莱基荣获德国亚琛市卡尔国际奖。1952年当选为欧洲运动主席。他还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东京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其代表作有《泛欧》等。^①库登霍夫-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欧洲思想之父”。^②

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是欧洲一体化历史(Europäische Integration)研究中的新课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它都居于学科研究的前沿。上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西欧联合运动中的欧洲观念(Europa Idee)是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基础。^③8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二战期间欧洲抵抗运动中的欧洲观念是战后一体化的思想起源。^④90年代,随着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国际上的欧洲一体化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学者们逐步将两战间“泛欧”运动

^① Vgl. Walther Killy (Hg.), *Deutsche Biographische Enzyklopädie*, Bd. 2, München: Saur, 2001, S. 385.

^② Jürgen Elvert, *Mitteleuropa! Deutsche Pläne zur europäischen Neuordnung (1918—1945)*, Stuttgart: Steiner 1999, S. 7. 在联邦德国的官方档案中,卡莱基也被称为“欧洲思想之父”。Karl Holl, *Europapolitik im Vorfeld der deutschen Regierungspolitik. Zur Tätigkeit proeuropäischer Organisa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19, 1974, S. 33.

^③ Walter Lipgens, *Die Anfänge der europäischen Einigungspolitik*, Bd. 1: 1945—1947, Stuttgart: Klett, 1977; Walter Lipgens, *Die Anfänge der europäischen Einigungspolitik, 1945—1950*, Stuttgart: Klett, 1977.

^④ Walter Lipgens, ed.,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1, *Continental plans for European Union: 1939—1945*, Berlin: de Gruyter 1985; Walter Lipgens, ed.,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2, *Plans for European Union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Exile: 1939—1945*, Berlin: de Gruyter, 1986.

中的“泛欧”观念纳入研究视野。德国基尔学者于尔根·埃尔维特(Jürgen Elvert)称,卡莱基的“泛欧”观念是欧洲一体化的“现代精神起源”。^① 2003年,德国图林根学者瓦内萨·康策(Vanessa Conze)出版了第一部有关卡莱基的历史传记。^② 该书没有发掘新材料,主要参考、使用了卡莱基本人撰写的自传、回忆录,对“泛欧”运动及其“泛欧”思想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第一部有关卡莱基的实证研究,是由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学者阿尼塔·齐格霍夫-普雷腾哈勒(Anita Ziegerhofer-Prettenthaler)于2004年完成的。^③ 她系统地调研了现存莫斯科国家档案馆的“泛欧同盟”档案材料,用它们恢复了“泛欧”运动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主要政治活动等历史原貌。但西方学者至今未对卡莱基的“泛欧”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陈乐民对卡莱基的“泛欧”思想进行了初步的介绍。^④ 他当时主要参考了卡莱基在美国流亡期间撰写的英文自传。^⑤ 由于语言和材料的限制,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国内未能对此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⑥

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外学界来说,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困难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卡莱基为了开展政治运动的需要,经常随着形势改变自己的说法,让人难以把握他的真实思

① Jürgen Elvert, *Mitteleuropa! Deutsche Pläne zur europäischen Neuordnung (1918—1945)*, S. 7.

② Vanessa Conze,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 Umstrittener Visionär Europas*, Zürich: Muster-Schmidt Verlag Gleichen, 2004.

③ Anita Ziegerhofer-Prettenthaler, *Botschafter Europas: 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 und die Paneuropa-Bewegung in den zwanziger und dreißiger Jahren*, Wien: Böhlau, 2004.

④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97—206页。

⑤ R. N. Coudenhove-Kalergi, *Grusade for Pan-Europe*, New York: Putman, 1943.

⑥ 在此期间,国内的一体化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它们多对“泛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参见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99—300页;洪邮生:《欧洲的梦想与现实:欧洲统一的历程与前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胡瑾、邹庆治、宋全成:《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5页;等等。